



西渡著

守望与倾听



发现文丛

中央编译出版社

守望与倾听

西 渡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望与倾听/西渡著 . -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2

(发现文丛)

ISBN 7 - 80109 - 372 - 0

I . 守… II . 西… III .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1612 号

守望与倾听

西 渡 著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17130(编辑部) 66171396(发行部)

E - mail: cctp @ public.east.cn.net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180 千字

印 张:10

版 次:200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发现文丛》总序

在我们的时代，精神的价值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物质主义正在腐蚀人性中最珍贵的部分，个性丧失的前景威胁着每一个人。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写作意味着维护人之存在的个性的最后努力，正是这种努力为我们保存了人类最后的尊严，维护了人的精神生活的神圣性质。我们相信不是别的，恰恰是一个时代的文学证明了它的精神活动的深广程度和价值所在。因此，写作就是对人类精神价值的坚持、探索和发现。这正是我们将这套文丛命名为“发现”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文学寄身于未来，而非对传统的简单继承，或是对现实的屈从。布罗茨基说：“除了艺术所勾勒的未来，一个人没有别的未来。”正是一个人的美学经验保证了他的道德选择的正确与精神的自由，这就是文学以及其他一切艺术创造活动的价值所在。因此，文学从来就是勇敢者的行为，带着它独有的精神冒险的性质，它需要纯洁的热情、不计后果的勇气、智慧和悲悯之心。在一个精神贫乏的时代，献身文学意味着劳作、寂寞、无名和时代的冷眼，但文学本身将因之愈益显示出它独有的光辉。

守望与倾听

我们认为,这个时代并不缺乏优秀的文学,而是缺少对这些精神活动的成果的同情。每一个独立的写作者都是一颗寂寞燃烧的星球,在时代的暗夜里静静放光。但人们宁愿为满足口腹之欲而一掷千金,却不愿拔一毛为我们饥寒交迫的灵魂添一块御寒的围巾。我们决定编辑这套《发现文丛》,就是要向那些精神世界的创造者献上同道者的敬意,使他们在漫长的冬夜里感受到一点点同情的温暖。

发现,对文丛的编者来说,就是以同情的态度去认识那些在精神世界中辛勤劳作,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探索者的成果,把它们推荐给广大的读者。发现,就是对精神价值的坚持和对精神世界的不断构筑和重新发明。发现,也是对那些把阅读视为一种文明行为的读者的呼唤和邀请。我们希望它成为一套能够给读者带来惊喜的文丛。这是我们将这套文丛命名为“发现”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希望通过这项工作对我们时代精神活动的成果有所推广,为在时代的寒夜中传播人类精神文明的火焰尽我们的一份绵薄之力。文丛第一辑先推出森子、秦旭、罗珠、西渡随笔四种,以后将陆续推出诗歌、小说、批评等专辑。

“发现,正是这个词,正是这条道路,虽然平凡、谦恭,却注定要通向伟大的终点。”(臧棣语)

《发现文丛》编委会

目 录

《发现文丛》总序

- 词语的谦卑 /1
- 追寻内心生活 /7
- 写作的阴影 /10
- 公众时代的写作 /14
- 批评的标准 /17
- 当代诗歌的题材与形式 /20
- 诗歌中的声音问题 /24
- 写作的权利 /33
- 现代诗在台湾的命运 /52

- 历史意识与 90 年代诗歌写作 /76
- 关于 90 年代诗歌的问答 /84
- 凝聚的火焰——90 年代诗歌案例之一 /102
- 90 年代诗歌的检阅——90 年代诗歌案例之二 /134
- 重提修远 /144
- 臧棣的位置 /147

诗歌的校园 /153
燕园学诗琐忆 /180
发现诗歌 /208
戈麦的里程 /212
死是不可能的 /219
拯救的诗歌与诗歌的拯救——戈麦论 /227
以梦为马的诗人 /243
再生的海子 /246
面对生命的永恒困惑:一个书面访谈 /250
思考与解释 /280
时间的诠释 /289
关于诗的札记 /296
不道德的诗人或诗人之死 /300
向诗歌致敬 /304
筛子上面的与筛子下面的 /307
后记 /310

词语的谦卑

1

我只信任一种存在，就是语言的存在。

诗歌所终极关心的是人的存在，亦即人在宇宙和社会中的境况。而这个存在，首先是语言决定的存在。文明的进化和历史的进步也只有从语言积累的角度来考察，才具有实际的意义。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典型地体现于我们和语言的关系中。只有借助语言的揭示，世界才有可能为我们所认识。而语言作为我们理解和领悟世界的途径，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能力的一个界限。“我的语言的尽头意味着我的世界的尽头。”（维特根斯坦语）我们的心灵也正是在语言的精心培育下，才逐渐成长和成熟起来的：如果我们要体验爱情，我们就必须先发明爱情的词汇。语言先于我们的强大存在以及它和人类个体的关系，体现了人的一种宿命。

语言已命定地成为诗人惟一的领域。语言的发现，就是对存在本身的开掘，就是向远方推进我们经验的边界。诗歌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诗人们已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只有作为语言的发现才是可能的。这样一种语言，它既不是表现的语言，也不是摹仿的语言，而是一种发明的语言。我们通过发现它，同时也将发现我们自身：在

守望与倾听

那一刹那，语言和存在彼此照亮。

诗歌语言是自足的和封闭的，不指向任何功利性的关系——“它毁灭了语言自发功能的本性，保存下来的只是这些关系中的运动和音乐，而不是它们的真相”（罗兰·巴特语）。现代诗歌，由于它的基于尊重语言的原则，必然是客观的。有眼光的批评家，早已在我们之前达到这个结论。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一文中曾相当明确地指出：“现代诗歌是一种客观的诗歌。”语言的发现将是人类对于存在的最富于冒险意味的开掘，因此必然伴随着失败和屈辱，但发现的荣耀将恰如其分地安慰我们的献身。很显然，这样一种诗歌将尽可能回避过分的个人感情的流露。——现在，诗歌业已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它已越来越要求摆脱人的控制，成为它自身，并且只为未来而献身。

由于上述的理由，诗歌的伦理性将受到最强烈的质疑。“诗歌的字词永远不可能是虚假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完整的；它闪烁着无限的自由之光，时刻准备照耀那些不确定而有可能呈现的千姿百态的关系。”（罗兰·巴特语）一种建立在语言发现的基础上的诗歌，我们不能说这是真诚的，那是虚伪的；我们也不能说这是高尚的、引人向上的，那是堕落的、低级趣味的。我们将只能说这是好诗，因为它自始至终尊重语言，受着语言的引导，并拓展了我们的存在；而那是失败的、不成功的诗，因为它粗暴地对待语言，并因而对我们关于世界的认识没有任何补充。

词语的谦卑

所必须具备的五种能力：观察和描绘的能力；感受性；沉思的能力；想像和幻想的能力；虚构的能力。但他恰恰忘了另一种对诗人来说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的能力，即语言的能力。

对于华滋华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原谅他的疏忽，因为那时人们还没有区别散文和诗歌的语言，而语言作为工具，还安心地居住在仆役们脏乱的下房里。相反，在现代诗歌中，语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对于我们，华滋华斯所说的五种能力，是以语言能力为基础的。观察是语言的观察，感受也是语言的感受。离开语言的能力，诗人的感受性将没有着落，想像和幻想将不能飞翔，沉思也将没有对象。

这一对诗歌语言发现的过程，是从波德莱尔开始的。他首次把美从真善美的三位一体中分离出来，使诗歌获得一种独立的意义。他已庄严宣布：“诗除了自身外，并无其他目的，它不可能有其他目的。”灵感所窃据的崇高地位开始受到怀疑，因为“一切美的、高贵的东西都是理性和算计的结果”。这使得对语言的发现和尊重成为可能，未来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虽然显得气势汹汹，但他们一开始是以语言的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进一步把语言从语法的束缚中拯救出来，区别了散文语言和诗歌语言，使诗歌语言从“关系”的牢狱中一跃而出，以一种崭新的、自由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他们对待语言的态度仍然是粗暴的，这种认识和行动上的不彻底使语言的发现在超现实主义那里被引向了歧途。

超现实主义的自动写作并没有建立在对语言尊重的基础上，它对语言的发现实非它的初衷。它较之象征主义，甚至更加有悖于现代诗歌的精神。首先它是主观和非理性的，这与词语本身所隐含的理性精神难以相容；其次，超现实主义者是

守望与倾听

诗歌实用主义的信徒，他们的社会理想迫使他们越来越远离诗歌本身。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超现实主义者所采用的方法。这是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第一次宣言》中的招供：“先在最有利于使思想集中到其自身的一个地方坐好，然后准备好写作的工具。尽可能使您自己处于最被动的或最容易接受的状态。……不要预先想好主题，快速写去，快得使您无法停笔，使您来不及产生作罢的念头。第一个句子单独产生了。它是如此真实以致对于只想外露的我们的意识来说，它每一秒钟都是陌生的……”这里有两个必须考虑的困难：首先是如何控制意识不溜进自动写作的过程中来。因为根据经验（我和我的朋友曾相当认真地从事这一实验），要屏绝意识溜进你的诗行是相当困难的。我们越是有意识地不让意识进入，意识企图参与活动的愿望也越强烈（有趣的二律背反）。布勒东私下里也对这点供认不讳：“应当指出，即使在最不受支配的人笔下，仍然可以发现某些麻烦，总是存在最低限度的指导……”其次，自动写作从它产生时起便被超现实主义视为探索潜意识的特殊手段和解放精神的有效方法，因此，自动写作的目的首先不是语言的发现，而是探索人的意识领域的一种手段。由于超现实主义明显的功利性，他们的发现不可能是彻底的。他们对于诗歌的贡献在于，通过它们的实验，使诗人窥见了语言的无限可能性，以及字词之间自身的强大的结合能力和繁殖能力。这离当代诗歌对语言的态度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一个优秀的诗人会设法让自己懂得对语言保持谦卑。现

词语的谦卑

代汉语的迅速成熟,一方面得益于汉语自身的积累,另一方面也有赖于西方现代诗人对语言的新发现的刺激。在超现实主义者弃采的旧矿山中有着真正的金子。世界性的现代诗歌的迅速崛起和成熟,正是以超现实主义实验室为苗床的。当代中国诗歌无例外地也发轫于这个语言发现的大背景。第一个为此作出贡献的当然要数朦胧诗的始作俑者。朦胧诗刚出现的时候,曾经因为其语言的新颖引来许多恰当的和不恰当的批评,但它最终还是成功地把一种新的语言观念引进到中国当代诗歌中来,使人们确信诗歌写作应该采用一种不同于我们的日常语言的语言。这是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之一。之后,一批得风气先的青年诗人刻意在语言上作更大胆的探索,许多人或真或假地宣称为语言写作。

但是在泛滥的宣言之后,我们考察这些年来诗人们所提供的文本,我们一定会深感失望。随处可见的依然时对语言的粗暴和变本加厉的役使。个人凌驾于语言之上和由此而来的语言的挥霍,制造了令人更加触目惊心的文字垃圾。我们是态度暧昧的一代:我们做惯了主子,因此对突然强加给我们的仆人身份感到难堪和不适应。但如果你是一个有出息的人,你必须设法让自己理解这些变化,并且自始至终对这位一下子从我们的下房冒出来的主人保持尊重。那么,我们如何去建立一种以语言发现为基础的诗歌呢?超现实主义者发现字词之间具有一种强大的结合力和繁殖力。在词语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隐秘的联系。这使得某些表面上看来间隔很远的词语彼此相亲,就像罗密欧和朱丽叶彼此吸引一样,而它们的结合还将产下它们更加强大的下一代。更有意义的是,一个字、一个词、一个句子不但存在这种与其他字词结合的能

守望与倾听

力和可能性,而且它们自身都有一种发展成为一首完整的诗的渴望,好像语言本身就是为了诗歌而产生的(就像颜料之于绘画,砖之于建筑一样)。诗人的语言天赋、长期的阅读和写作的实践,有可能使他获得一种能力,去发现语言之间这种内在的秘密。当然,首先他必须进行实验。需要提醒的是,实验并不是无所顾忌。恰恰相反,它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警惕,需要我们像物质一样保持小心翼翼。其次,当我们从事这一试验的时候,千万不可以忽视理性的作用。我们必须运用从阅读和写作实践中得来的经验以及其他间接得来的经验,调动我们的意识,慎重地考察我们写下的每一个词语,使之自始至终建立在语言的内部联系的基础上。由此建立起来的诗歌文本,提供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存在。它的每一行诗都包含它自身存在的秘密。它不是对宇宙的阐释,而是和另一个宇宙息息相通,互为映证。

我相信诗人是幸福的。他通过和语言的相互占有,比人们更多地了解世界的秘密。他通过发现语言,最终也发现和创造了他自身精神的存在。他的工作的意义将是恰如其分的——更多的人们通过阅读诗歌,同样也分享了这种语言的神奇光芒。人们的生活正是由这种光芒所照亮的。因此,我感激先辈和大师们,他们使我一开始就置身一种强大的光芒中。我随时告戒自己保持谦逊,因为,作为读者,我首先受惠于这一神奇的语言之光。

1991年9月

1992年1月

追寻内心生活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上，我们正处在一个物质上富足而精神上却十分贫乏的时代。尽管仍然存在一些物质上处于贫困状态的地区，但就总的说，我们这个时代在物质上富足的程度肯定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却被精神的贫乏深深困扰着。当我们考虑到 20 世纪正面临结束前的最后几年的时候，这种困扰的性质就尤其显得耐人寻味。

18 世纪是以法国大革命作为其结束的标志并以此为新世纪献上了一份丰厚的精神馈赠。上一个世纪中叶，波德莱尔发表了当时惊世骇俗的不朽之作《恶之花》。此后的 100 年，成为有史以来人类的意识最为活跃的时期，在此期间，我们的意识经受了各种极端的、非极端的思潮的洗礼。这 100 年可谓人类群星闪耀的时期。此外，自然科学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以此迎来了我们这个时代物质的丰富和发达。但从进入本世纪中叶以来，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人类意识的发展却沉寂了。值得一提的可能是拉美的文学爆炸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文学爆炸的两位巨匠，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在某一个圈内，确实产生了世界性影响，但他们的影响却丝毫没有波及公众的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则是一股颇为可疑的思潮，至今对它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界说。它的主要词

守望与倾听

汇来自西方一些人文学者对战后某些文学、艺术和社会现象的批评。这种批评在很多场合是以造反的姿态出现的，带有其特有的即兴的性质。由此发展起来的一些认识，断然否定了人的精神的高贵，而且取消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这种取消是以把人统统拉到一个最低级的层次上为代价的。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余音未息，后现代主义者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人死了。

我相信这样一个时刻终究是要到来的。从这个角度说，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它不过催化了这个时刻的到来，但其匆忙下达的结论却使它顺水而下，成为时代潮流的同谋。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各方面仍相当落后的国家，其取悦公众的心态可谓昭然若揭。它从两方面取媚于世，一边是公众，另一边是主流意识形态。这样一种明显媚俗的潮流，我们有理由怀疑其严肃的价值。

在我们的时代里，价值已面临可怕的沦丧。物质主义腐蚀了人性中最珍贵的部分，人的个性正在丧失。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写作意味着维护人的个性的最后努力，正是这种努力为我们保存了人类最后的尊严。我曾经在不同的地方强调写作与人的个性的这种依存关系。不过我现在注意到，个性是一个含混的词汇。它很容易被误解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人们在具体场合的表现等外部态度。我们将会发现一个性格特征明显的人，仍然难以被称为一个具有个性的人。因为我们在个性这样一个说法里强调的，恰恰不是一个人的外部表现，而是指他的内心生活。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的丰富、生动和复杂程度是他的外部生活所无法比拟的。但是这种多姿多彩的内心生活正日益受到我们的外部生活的侵蚀。这种侵蚀正是

追寻内心生活

以物质的丰富遮人耳目而达其目的。我这里说遮人耳目，是在这个词的原始意义上使用的。电视、电影、广播、报纸等大众传媒的发达正足以遮人耳目，并进而起到惑人心智的作用。一个受到大众传媒辖制的现代人，已很少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耳朵倾听，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了。我们在身体和心智的各方面都面临着退化的危险。这种退化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内心生活的萎缩。我们这个时代精神贫困，正是以内心生活的贫乏为其标志的。写作，无论在何时代都是以内心生活作为其直接的养分的，而在我们的时代，写作正意味着对这种精神的贫困状态的反抗。由于这种反抗的个人性质，写作只能是一种单兵作战的行为，它在我们的时代同时意味着孤独、贫困和无名。但写作的魅力及其美好的性质，绝不会因此比以往任何时代有所逊色，它对一部分执着的写作者甚至因其挑战和冒险的性质而变得更加富于诱惑性。这对于被精神的贫乏所困绕的人类，是一种默默的祝福。很可能，它还是一种拯救。

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是否必然地带有一种挽歌的性质？为什么夜深人寂之时，我仍然能够倾听到一些人在用纸和笔挖掘的声音？但挖掘并非为着埋葬，而是为着发现和保存人性中最珍贵的东西，为着维护人的内心生活的神圣性质。如果我们时代的写作确实是挽歌，那它也确实为我们挽留住了那些至今仍然不能被抛弃的东西——在我们的时代，正是写作行为本身典型地体现了它所独有的尊严。

1992年4月20日

写作的阴影

以海子 1989 年春天的自杀为开端,中国诗歌界接连发生的悲剧性事件带给我们的震惊,显然压过了我们的悲痛。当我们还来不及痛定思痛,这些事件已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我们的写作背景。它们的阴影溶解在我们的意识,乃至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写作的行为越来越带上一种宿命的意味。而我们这一代人恰巧是在这样一种阴影下进入写作的。

对于今天派诗人来说,写作的阴影更多地来自时代和环境的压力,来自一些外在的力量对写作行为的限制。因而他们的写作带有明显的对抗的性质,并进而在其创作中呈现出英雄主义特征。对于从那以后开始写作的更年轻的一代诗人来说,成为英雄的机会已经一劳永逸地失去了,但时代和环境的压力对他们仍然没有过时。生存的艰难令他们付出了过多的精力。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在公开渠道上发表作品,仍然只是不切实际的奢望。由于缺少交流,他们只能为少数圈内人写作。这进一步造成了他们的孤立。商业意识的普及几乎在一夜之间夺去了诗歌的读者,甚而许多优秀诗人也在这商业化的暧昧的夜间悄然消失了。因此,对于此后仍然坚持写作的诗人而言,他们必须同时面对来自正统的歧视和公众的冷漠。但是,这并不构成真正的阴影,因为环境的压力也许恰恰造就了诗人的倔强的个性。